

重读依然是教诲

——写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73周年之际

□ 谢煜桐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件。从8月14日起，新华社在一个月零2天的时间里，先后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文章（史称“五评白皮书”）。《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五评白皮书”的第一篇。重读此文，思想深处触及了三个问题。

一是文章标题是一个祈使句，那么祈使句中被省略的主语是谁？这应该是关注和学习评论文章的第一个问题。文中很快给出答案：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文章在论证了帝国主义给自己创造灭亡的条件后，列举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对于即将取得人民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所持的态度，即“获得了数百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但是文章也同时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基础。”写到这里，毛泽东就点出了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主体和主语，也就是整篇文章所要指向的对象。

二是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什么还没有“丢掉幻想”，还没有“准备斗争”？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因此，毛泽

东挑明了说：“‘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毛泽东进一步地不避讳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三是怎样才能使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呢？毛泽东提醒说：“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他指出：“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毛泽东在论述中，详细地描述了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给他们画了一幅生动的政治肖像。他明确指出，艾奇逊们认为的属于所谓“鼓励”的工作，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这又是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艾奇

逊们所始料不及的，“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毛泽东总结道：“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分析至此，文章已完全刺到了民主个人主义者思想和感情的痛处。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毛泽东展现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革命的乐观前景，他写道：“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尽管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点出了中国有那么一些糊涂的人，尽管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存在，也有着些许的隐忧，但是，他更多地看到，“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这是大的时代局面；“全中国热气腾腾”，这是好的革命形势。“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这是我们的宣传尤其是思想工作所要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将结束之际历史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道“课后作业”。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去进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伟大事业。

70多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引发的毛泽东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所揭示的主题依然没有过时，内中思想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重读此文，教诲依然是深刻的。

红色记忆

青 岬 堂 中 一 修 竹

——清代学人名臣邓廷桢

□ 李晓巧

众所周知，在中国近代史上，邓廷桢是同林则徐一起禁烟和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邓廷桢官至一品总督，是清代朝廷重臣，从其一生经历来看，他不仅是一代名臣，还始终是一位学人儒者。

勤政有为，任上建功

清初，在江宁城（今南京）西南隅有座花园宅院，园中有亭台、池塘，另有修竹万竿，气象万千，称为万竹园。园子主人叫邓旭，祖籍江南省寿州（今安徽省淮南一带），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曾任甘肃岷峡道副使，罢官后定居江宁。他就是邓廷桢的五世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邓廷桢出生在万竹园，邓廷桢字维周，又字嶠筠。“嶠筠”有山涧的青竹之意，与这万竿修竹应有渊源。

嘉庆六年（1801年），邓廷桢中进士，此后有9年时间在京城任词臣，其间担任过乡试、会试考官。嘉庆十五年（1810年）后，邓廷桢开始任职地方，由知府、按察使、布政使，积功累绩逐步升迁，位至疆臣。邓廷桢为官做事，思路缜密、周到务实，得到上级和朋僚的认可。自道光六年（1826年）开始，邓廷桢担任安徽巡抚近10年，任内体察民情，勤于政务，颇有政绩，受到清廷多次嘉奖。同时，作为地方大员，他提倡俭朴、不喜奢华，常常过问自己的生活开销，也要求部属克勤克俭。

道光十五年（1835年），邓廷桢调离安徽前，手书明朝贤臣于谦的《入京》诗一首自况并勉励同僚部属：“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邓廷桢以清廉自持，关注民生，多有惠政，深得安徽百姓士绅赞许。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时，邓廷桢正任两广总督，协同林则徐竭尽全力为国禁烟、抵抗外敌。道光十九年底（1840年初），在短短20多天里，邓廷桢“调两江总督，旋调云贵总督，复调闽浙总督”，四处辗转奔波处理政事，但是他毫无怨言，积极筹划沿海防务，彰显了公忠体国的节操。在被遣戍新疆后，邓廷桢也是以积极心态与当地官员相处共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邓廷桢获赦复出，很快就任陕西巡抚署陕甘总督，为甘肃、宁夏地区的垦荒劝农殚精竭虑，受到道光帝嘉奖：“所到之处，劝谕详明，妥速赈事，甚属可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邓廷桢积劳成疾卒于任上。

《清史稿》评价邓廷桢曰：“廷桢治行早为时称，屡蹶屡起，宣宗（道光帝庙号）知之深”；“邓廷桢与（林）则徐同心御侮，克保严疆”。总的来说，邓廷桢坚持了儒家倡导的忠君报国思想。

持身端谨，公门守正

邓廷桢字维周，“维周”一词出自《诗经》：“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迄用有成，维周之桢”。古人常以字号来表达志节和愿望，由此可见，做个正

直能干、志节高尚的国家栋梁和贤者，是邓廷桢人生的价值取向。邓廷桢晚年自号“刚木老人”，以“木质坚硬的老树”自况，更见其老当益壮、老而弥坚的端谨品格。

邓廷桢在著文中写道：“余里居之堂曰：青岬，因竹得名也。”青岬堂是他在金陵万竹园中读书生活之所。在传统儒家文化中，竹子乃“君子”代名词。青岬堂之名，也体现了居住主人的操守品性。就是在这样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浸润中，邓廷桢读经书、考科举、入仕途。

任安徽巡抚时，邓廷桢做过一件功德之事。他体察民情、访问疾苦，发现辖境内颍州官府发配犯人充军时，妻子也要随同发配，这给无辜妇女造成了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甚至是伤亡，他认真调研后立即请求朝廷废除了这个陋规弊政。这件德政深为安徽百姓称颂，名士文人也提笔传扬，如《纪邓嶠筠中丞善政》之《颍州妇》中提及“君不见颍州妇女免匪辜，公（邓廷桢）为朝廷布仁政”。其事迹也被记录进《清史稿》和《清史列传》。

从一些史料来看，邓廷桢接任两广总督初期，由于起初对鸦片的危害知晓不多，禁烟举动并不严厉，但是在认识到鸦片的巨大危害之后，禁烟

决心极为强烈，所查获鸦片数量巨大。当林则徐被委任为禁烟钦差大臣后，邓廷桢也立即写信向其表达协助禁烟的决心和信心。

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邓廷桢就被遣戍新疆，但他依然尽其所能为新疆建设出谋划策，得到了当地官民的一致认可，并且与同戍的林则徐惺惺相惜、互相鼓励，建立了旷世友谊。《说元室述闻》中记载：“上元邓嶠筠制府廷桢，道光中名臣，与林文忠（则徐）齐名，交亦莫逆。”

那年高中毕业，正赶上农村开始大包干，我家分到了8亩责任田。等生产队把土地、粮食、牲畜、农具等集体财产分完，已是“芒种攸然至，无边麦垄黄”，家家户户开始收拾农具把扫帚，迎接麦收。当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弟弟还在上学，作为家里的青壮劳力，我和三姐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

有句老话叫“面朝黄土背朝天，腰酸腿疼割得慢”，是对割麦的生动描述。凌晨四点来钟就起床，拿着头天晚上磨好的镰刀，掂一罐井水，踏着朦胧的月光，快步朝离家二三里远的一块麦地走去。到了地里找准边界，弯下腰，左手拢麦，右手挥镰，一门心思向前割。不知不觉，已经日出三竿，太阳开始火辣辣的炙烤，汗水不断地侵袭衣衫。直起腰来，用袖子擦擦汗，抱起水罐咕咚咕咚喝几口，马上又弯腰割起来。就这样，用了几个小时才割完。

回家吃完早饭，给架子车装上挡头，扔上桑杈和绳子，就下地拉麦。由于不会装车，头一车费了不少劲，好不容易装起来了，路上遇到几个坑，架子车颠簸几下就翻了。感谢路过的乡邻出手相帮，指点迷津，才顺利拉到了打麦场。又装了两车之后，已基本掌握了要领，到了下午，车子就装得又高又宽又瓷实，拉起来也稳稳当当。

麦熟一响，虎口夺粮。经过几天的披星戴月，终于把小麦全部割完，并拉到场里垛起来，防雨淋、防牲畜、防大风，等轮到自己家了再摊开打场。

芒种芒种，连收带种。趁这个空当，我和三姐赶紧扛起锄头下地，起早贪黑，趁墒抢种玉米。如果邻居们打场人手不够，还要停下来去场里帮忙。村里民风淳朴，人情味浓厚，邻里之间相互帮衬，不讲报酬，打个招呼就招之即来。

轮到自家打场那天，全家老少齐上阵，还要请人帮忙。一大早把

麦垛扒开，均匀地摊满麦场，接受太阳暴晒，中间再翻两遍，尽量晒透晒焦。摊完场，别人都回去小憩，我留下来看场，找一块场边的小树荫躺下，谁知闭眼就睡着了，火辣辣的太阳悄然转过来，照在身上也浑然不觉。等到被前来翻场的人叫醒，才发现自己正在接受日光浴，站起来一看，汗水已经在地上勾勒出清晰的人形轮廓。

吃了中午饭开始碾场，碾几圈翻一遍，碾好了就看向收堆场场。扬场是个技术活，会扬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我就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戴上草帽，上场跟着扬起来。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纷纷扬扬的麦糠飘落在身上，钻心的刺挠，那种滋味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好在一个麦天坚持下来，我也成为扬场的一把好手。

那时候，过一个麦天，少说也得半个月，多则二十天，人被晒得脱了一层皮儿。等忙完了麦收，种上了秋庄稼，三夏就剩夏征了，也就是农民口中的交公粮。

大集体的时候，生产队每年会组织精壮劳力，赶着牛车交公粮。分田到户以后，公粮被分摊到每家每户。一到交公粮的日子，早上把小麦从家里拉到打麦场晾晒，吃了中午饭就赶紧收起来。收的时候，捏几粒小麦送进嘴里，用牙咬一下有咯牙的感觉，甚至听到嘎嘣的声音，才能放心。

去交公粮的时候，往往是两三家邻居凑一架子车，前拉后推。到了县粮库，总是排着长龙，交过一家，烈日下的车辆向前挪动一点。终于排到跟前了，提前解开口袋，检验员伸手抓出一把，目测麦子质量、感觉干湿度，然后拿起空心铁棒插进口袋，检查顶底是否一致。检验合格，过完磅秤，我就扛起100多斤的口袋走进库房，沿着麦堆上用长木板铺成的小路，踩着上面的台阶，小心翼翼地往上走，一直走到最高处才能倒掉麦子。几趟下来，早已汗流浹背。

那时候，只有十七八岁的我喜欢读书看报。有一天，看到报纸上介绍国外的农业生产机械化，他们用机器收打小麦，从地里出来就是



干净的麦秆儿，心里特别羡慕，连晚上做梦都在想，啥时候咱中国也能实现机械化，收麦也不用出死力？

麦子种了收、收了种，我心中对机械化的期盼，一年比一年强烈。

真是想不到啊，没过多少年，我当年的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广袤的平原地区农村，早已告别了几千年的传统耕作，快速走进了农业机械化时代。那种镰刀割、石碌碾、木锨扬的麦收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就连绵延数千年的“皇粮国税”，也被政府免除了。这个神话般的奇迹，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见证了国家的发展进步，更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明天。

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听着远处收割机传来的阵阵轰鸣，我脑海中从小到大印记的那些麦收场景，正渐渐飘向遥远的地方。

方期间，邓廷桢特别注重文教和培养人才。道光九年（1829年），时为安徽巡抚的邓廷桢札飭各府州县对考棚重新修葺，并增添寿州考棚，造福莘莘学子。并对省城安庆的府学殿庑加以修葺，改进生员就学环境，他还常去学官看望儒生，同他们切磋讨论“讲论不倦”。值得一提的是，邓廷桢任安徽巡抚期间，还参与了《安徽通志》的修撰工作，道光九年（1829年）六月成书，受到清廷嘉奖，为安徽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史籍。

邓廷桢严于修身律己，“尝以韵语论治术，命曰八箴”，时刻警醒自己恪尽职守。他对子侄后辈也管束甚严，常告诫他们务必清白做人、自强不息，“要留姜桂性常存”。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子们也都继承了良好的家学家风。《清史稿》言邓廷桢乃“名节播宇内、焕史册”的名臣。

青岬堂中一修竹，浮沉仕途无改色。青年时代，青岬堂里，早就刻下邓廷桢的儒者底色和人生抱负，数十年仕途生涯，历经波折，始终不改清正务实之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邓廷桢不顾安危站出来坚决反对清廷投降派意欲割让国土的行径。

林则徐在邓廷桢70岁过寿时，赋诗祝贺，诗中有“寿者相兼全福五，老成人仰达尊三”之词，祝福他仁者多寿，五福兼具。正如林则徐所言，邓廷桢是很有德行而值得敬重之人。而林、邓二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皆有古名臣风。

